

“網紅城市”的社會風險影響因素及治理對策研究**

尹柯、陳積敏*

摘要：在數位平台流量機制驅動下，部分城市因快速聚焦而形成“網紅城市”現象，伴隨而來的則是結構性社會風險的持續顯現。本文基於風險社會理論、社會風險放大理論與城市韌性治理視角，構建階段演進、變數聯動分析框架，系統分析社會風險在熱度啟動、服務錯配、情緒發酵、治理滯後和形象反轉五階段中的傳播與治理的互動邏輯，並歸納平台傳播、公眾認知、城市服務以及制度回應四類關鍵變數的作用機制。研究認為，風險演化具有耦合遞進特徵，應通過前置感知、過程調控與輿情引導與多部門協同完善城市治理能力，為公安機關應對新興城市社會風險提供理論支撐與實踐路徑。

關鍵詞：網紅城市 社會風險 觸發路徑 城市治理

Social Risk Factors in Internet-Famous Cities: Analysis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Yin Ke; Chen Jimin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digital platforms and algorithm-driven traffic mechanisms, a number of cities have experienced sudden surges in online visibility, giving rise to the phenomenon of “internet-famous cities.” However, this heightened attention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structural social risks. Drawing on the risk society theory, the theory of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nd the framework of urban resilience governance, this study develops a dual-dimensional analytical model focused on staged progression and variable interaction. It identifies a five-stage risk evolution process—heat initiation, service mismatch, emotional fermentation, governance lag, and reputational backlash—and categorizes four key influencing variables: platform dissemination, public perception, urban service capacity,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social risk in these cities evolves through a coupled and progressive mechanism. Accordingly, the study proposes governance strategies that emphasize anticipatory risk sensing, process regulation,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nd inter-agency coordination. These findings offer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public security authorities to enhance risk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in the context of rapidly emerging urban phenomena.

Keywords: Internet-Famous Cities; Social Risk; Trigger Path; Urban Governance

* 尹柯，南京警察學院治安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城市安全與風險控制。

* 陳積敏，南京警察學院治安學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生態安全與治安學。

** 基金項目：本文係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長三角地區社會風險治理對策研究”（項目編號：2024SJZD118）的研究成果之一。

一、前言

近年來，隨着短視頻平台與社交媒體生態的迅速演化，城市形象建構與資源導流方式發生顯著變化。越來越多城市透過話題事件營造、消費場景重構與視覺景觀傳播等方式，在輿論空間中快速聚焦關注，形成出圈效應。此類依賴媒介推動與使用者參與而迅速獲得流量與話語權的城市，被普遍稱為“網紅城市”。這一現象不僅重塑了城市間的競爭格局與治理挑戰，也引發了諸如接待壓力上升、秩序管理困難與情緒輿情反轉等新型社會風險。儘管“網紅城市”現象帶動了城市旅遊、文創消費與數字宣傳等領域的發展，但其背後所隱含的社會風險日益受到關注。隨着部分“網紅城市”在短期內面臨流量激增、遊客集中、公共服務承壓與管理回應滯後等挑戰，公眾體驗與城市形象之間的感知差距逐漸顯現，社會關注開始從積極討論轉向對治理能力與服務承載的多元評價。這些社會風險表現在多個層面：一是網絡輿情風險，例如因遊客不滿或個案衝突引發的大規模負面資訊擴散；^{[1]、[2]}二是公共服務風險，如交通擁堵、食品安全、接待能力不足等治理難題；^{[3]、[4]}三是情緒傳導風險，即網絡社群對城市表現的非理性放大、標籤化與反轉。^{[5]、[6]}這些問題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在特定條件作用下，沿着一定路徑逐步積聚、放大並最終爆發，表現出典型的社會風險觸發鏈條特徵。^[7]

基於此，本文聚焦於“網紅城市”中社會風險的形成機制與觸發路徑，擬探討兩個核心問題：其一，網紅城市社會風險的主要影響因素有哪些，這些因素在不同類型城市中呈現出怎樣的結構性特徵；其二，社會風險如何在現實事件與媒介傳播的互動中被激發、積聚並沿特定路徑演化。為此，本文選取典型案例開展事件程序重構與機制歸納，旨在為相關城市的社會風險治理與制度回應提供具有結構性的理論支援與實踐參考。

二、研究基礎與分析框架构建

本文在吸收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選取風險社會理論、社會風險放大理論和城市韌性理論作為理論支撐，構建風險路徑與影響因素雙維度分析框架，並結合典型案例，運用路徑重構、內容分析等方法開展實證研究。

（一）相關研究進展與問題提出

在數字傳播環境下，“網紅城市”作為一種流量型城市現象逐漸成為城市研究與社會治理研究的交叉議題。目前，國內關於“網紅城市”現象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其傳播機制、^{[8]、[9]} 文旅經濟拉動效應^[10] 及城市品牌建設等方面，^[11] 關於其衍生社會風險的研究相對較少。部分學者關注個別事件中的管理經驗^[12] 或媒體作

[1] 趙建國、蘆彥清：〈數位化敏捷治理與城市形象建構進路——以淄博市為例〉，《重慶社會科學》，2024年，第3期，第96頁。

[2] 趙雲澤、項甜甜：〈“網紅”城市的打造：社交媒體環境下主流宣傳模式創新探索〉，《未來傳播》，2024年，第6期，第31頁。

[3] 周振超：〈積極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路子〉，《探索》，2024年，第5期，第53頁。

[4] 宋瑞、楊曉琰、謝朝武、邢慧斌：〈新階段文旅消費潛力釋放與持續健康發展的建議和對策〉，《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2期，第23頁。

[5] 尚立志、李瓊：〈智慧城市安全風險表現及其治理效能研究——基於風險社會理論視角的考察〉，《學習論壇》，2023年，第2期，第75頁。

[6] 蔡禮彬、萬方亮、李平：〈從“網紅”到“長紅”：旅遊公共服務吸引力與供給次序——基於抖音“淄博燒烤”話題的使用者評論分析〉，《消費經濟》，2024年，第2期，第27頁。

[7] Pidgeon, N., Kasperson, R. E., & Slovic, P.,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8] 鄧婧等：〈流量經濟視角下傳統村落“網紅”變“長紅”的影響因素與路徑——以泉州市罍埔村為例〉，《自然資源學報》，2025年，第4期，第1107-1123頁。

[9] 曾一果、時靜：〈“網紅”日常化與日常“網紅”化：平台化社會網紅景觀批判〉，《傳媒觀察》，2025年，第2期，第80頁。

[10] 黃駿：〈城市形象的媒介化建構與“他者”行動網路——以“哈爾濱出圈”為例〉，《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4期，第153頁。

[11] 吳文旭：〈“人-媒-城”：網紅城市發展模式集聚特徵與分類治理策略——基於長紅城市Top30的資料分析〉，《電子政務》，2025年，第1期，第13頁。

[12] 張志安：〈從網紅到長紅：媒體如何助力城市傳播〉，《傳媒》，2024年，第20期，第18頁。

用，^[13]認為短視頻平台與社交媒體重塑了城市可見度，推動地方城市以情境消費與視覺行銷形式快速吸引公眾關注，實現出圈效應。^[14]當前關於“網紅城市”現象的研究不斷增多，但對由流量驅動所引發的社會治理壓力關注不足。特別是在風險生成機制層面，系統性剖析“網紅城市”社會風險觸發路徑及其結構性影響因素的研究仍較為薄弱。一方面，現有研究多停留在個案經驗或現象描述層面，缺乏對社會風險動態演化過程的整體建構，難以揭示其內在階段邏輯與擴散機制；另一方面，對於風險形成過程中平台傳播、公眾情緒、服務資源與制度回應等多重要素之間的耦合作用，尚缺乏系統整合與結構性分析框架，難以支撐理論深化與實踐指導的雙重需求。針對上述不足，本文聚焦“網紅城市”中社會風險的傳播與回應動態過程，提出以傳播路徑識別與結構變數分析為核心的雙維度研究視角，以期響應城市傳播研究中對風險治理機制理解的相對不足的問題。

（二）理論基礎與分析視角

1. 風險社會理論：揭示社會風險的結構性根源

風險社會理論認為，現代性自身的制度安排、科技選擇與社會運行邏輯不斷製造出新的系統性不確定性，^[15]使風險從自然生成轉向社會製造，^[16]具有結構性、常態性與再生產性。^[17]“網紅城市”在流量驅動下迅速聚集資源與關注，但其背後卻隱藏着服務能力失衡、治理結構承壓與認知偏差等多重社會風險，這正是風險社會理論所揭示的深層結構性邏輯。因此，該理論為本文識別社會風險的系統生成邏輯提供了宏觀視角。

2. 社會風險放大理論：解釋媒介介入下的風險擴散路徑

社會風險放大理論強調，媒介在風險事件傳播過程中可能放大或扭曲公眾感知，^[18]從而引發情緒外溢、標籤固化與行動共振等次生風險。^{[19]、[20]}短視頻平台、社交媒體等機制在網紅城市風險事件中充當了放大器與加速器角色，不僅重新構造了城市形象，也改變了風險擴散的節奏與路徑。該理論有助於理解風險如何由個別事件或局部問題，在媒介干預與公眾傳播中快速積聚並演化為集體性治理困境。

3. 城市韌性治理視角：關注制度回應與系統適應能力

城市韌性治理理論關注城市在面對突發風險或壓力衝擊時的吸納、恢復與適應能力。^{[21]、[22]}在“網紅城市”中，制度回應是否及時、資源調度是否靈活、跨部門聯動是否高效，成為影響風險能否被有效遏制的關鍵變數。^[23]該視角為本文引入制度回應作為影響因素之一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也為後文提出階段化治理策略與多元協同路徑提供理論支援。

[13] 趙書虹、孔營營：〈媒體朝聖與網紅旅遊目的地的形成機制——基於淄博和哈爾濱的紮根理論分析〉，《商業經濟與管理》，2024年，第8期，第63頁。

[14] 嚴小翔、李濟翔：〈網紅城市何以長紅？影響城市品牌可持續性的因素——基於26個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城市發展研究》，2024年，第6期，第39頁。

[15] Douglas, M., & Wildavsky, A., *Risk and Culture: 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16] Giddens, 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 Beck, U.,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SAGE Publications, 1992.

[18] Renn, O., “Risk Communication and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in Kasperson, R.E. & Stallen, P.J.M. (Eds.), *Communicating Risks to the Public*, Springer, 1991: 287–324.

[19] Kasperson, R. E. et al.,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isk Analysis*, 8(2), 1988: 177–187.

[20] Pidgeon, N., Kasperson, R. E., & Slovic, P.,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1] Ahern, J., “From Fail-safe to Safe-to-fail: 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 the New Urban World”,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00(4), 2011: 341–343.

[22] Chelleri, L., Waters, J. J., Olazabal, M., & Minucci, G., “Resilience Trade-offs in Adapting to Urban Climate Cha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e Change Strategies and Management*, 7(3), 2015: 327–346.

[23] Meerow, S., Newell, J. P., & Stults, M., “Defining Urban Resilience: A Review”,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47, 2016: 38–49.

(三) 資料來源與案例選擇說明

本研究的資料獲取遵循多元化與典型性原則，力求通過跨平台、多渠道資訊整合來增強分析的真實性與解釋力。主要資料來源包括主流新聞平台、社交媒體內容和政務公開信息三類。其中，主流媒體如新華社、澎湃新聞、中國青年報等提供了風險事件的時間節點與官方描述，是構建風險演化路徑的權威依據。社交平台則承擔了風險擴散機制的觀測視窗，通過微博、抖音、小紅書等平台的使用者評論、視頻內容與互動話題，可以捕捉輿情演化軌跡和公眾情緒表達特徵。與此同時，地方政府通過政務發佈平台、公開通報和政策回應檔反映了制度回應路徑，為判斷城市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支撐。在案例選擇方面，研究採用理論抽象驅動下的典型性事件採樣策略，選取 2023–2024 年間在全國範圍內具有高度傳播影響力、事件結構完整且公眾參與度高的網紅城市事件作為分析對象。為保證案例之間的對比性與風險解釋的針對性，研究在選擇事件時，除考量傳播熱度與公眾參與度等傳播特徵外，更關注其是否呈現社會風險的潛在或顯性徵象。選取案例需符合以下條件之一：一是事件中曾出現接待壓力、秩序混亂、物價爭議等引發公眾負面反饋的內容；二是媒體或網絡使用者在事件熱點期產生情緒性話語放大，形成高互動輿情；三是城市管理部門出現回應遲滯或調控失誤的輿情質疑。部分案例如“淄博燒烤熱”與“哈爾濱冰雪熱”，雖整體輿論偏正向，但期間亦多次出現如服務承載不足、價格管控困難與治理協同滯後等討論，具有典型的社會風險觸發潛勢，適合作為風險演化初期的觀察樣本納入分析，見表 1。

案例名稱	城市類型	事件時間	事件特徵	社會風險表現
淄博燒烤熱	二線城市	2023 年春	地方官媒引導 + 社交媒體熱傳，遊客集中排隊就餐	接待服務壓力增大、食品安全與價格議題引發關注
哈爾濱冰雪熱	省會城市	2023 年冬	冰雪節活動帶動短視頻熱傳、熱點話題集中	交通擁堵、價格爭議、治理協調面臨壓力
天水麻辣燙潮	三線城市	2024 年春	網紅達人推薦 + 媒體聚焦，形成排隊景象與情緒話題	排隊擁堵與期望落差導致差評激增，社交情緒集中擴散
重慶洪崖洞擁堵	直轄市	2023 年國慶	節假日人流爆發，現場秩序混亂話題引發熱議	空間擁擠與安全爭議激化治理壓力與社會評價風險
成都春熙路湧入	新一線城市	2024 年五一	遊客湧入過載，社交媒體直播引發話題擴散	管理應對失速，社交評論指責密集，公信力面臨挑戰
長沙文和友潮湧	新一線城市	2023 年五一	美食排隊效應 + 社交爆款打卡，等候時間引發焦慮	服務體驗斷層激化負面情緒，輿情偏向負面話題主導
廈門曾厝垵爆紅	省會城市	2023 年暑期	視頻平台推薦引流形成旅遊擁堵	基礎設施超負荷、治理協調難度上升，輿情關注升溫
西安大唐不夜城熱	省會城市	2023 年春節	文旅直播 + 景觀夜遊話題熱推	遊客集中造成交通與秩序壓力，形成認知反差與議論擴散

表1 城市風險案例表

(四) 分析框架構建與邏輯設計

結合風險社會理論、社會風險放大理論與城市韌性治理視角所提供的分析基礎，本文構建了一個聚焦於社會風險觸發路徑與影響因素機制的雙維度分析框架，用以系統揭示“網紅城市”社會風險的演化規律與變數聯動機制，如圖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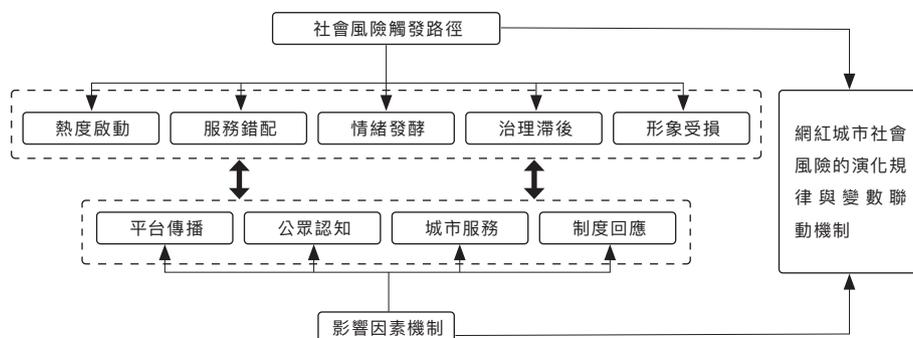


圖1 “社會風險觸發路徑與結構性變數聯動機制”分析框架圖

在路徑維度上，通過典型案例的過程重構，總結出“網紅城市”社會風險普遍經歷熱度啟動、服務錯配、情緒發酵、治理滯後、形象受損五個階段，呈現出由媒介邏輯驅動至制度回應介入的階段遞進結構，體現出傳播結構與治理系統之間的動態張力。在結構維度上，本文進一步歸納出平台傳播、公眾認知、城市服務與制度回應四類關鍵因素，分析其不同風險階段中的介入方式、主導強度與交互模式，揭示因素之間在特定路徑中的協同演進與耦合關係。本框架意在構建一個連接理論理解與實務應用的機制分析框架，既從結構維度闡釋社會風險生成的系統邏輯，也從過程維度識別風險治理中的關鍵環節與干預節點，為後續機制整合分析與治理建議提供基礎支撐。

三、網紅城市社會風險演化分析

本文立足於動態過程視角，圍繞事件推進、變數介入的結構邏輯，對“網紅城市”社會風險的演化路徑與關鍵影響因素進行系統分析。通過跨案例比較與階段歸納，識別風險由潛伏到爆發的階段性推進模式，並提煉在各階段中發揮主導作用的結構性變數，為後續對風險觸發機制的系統整合與邏輯建構提供理論依據與分析支撐。此外，部分案例雖未形成全面風險爆發，但其在流量衝擊下亦暴露出承載壓力、制度摩擦與輿情敏感等因素，適合作為風險早期警示與治理反思的觀察視角。

(一) 社會風險觸發路徑的階段劃分

通過典型“網紅城市”風險事件的歸納分析，可以發現其社會風險的生成過程並非隨機爆發，而是遵循一定的演化路徑和階段邏輯。本文將其劃分為五個連續發展階段：熱度啟動期、服務錯配期、情緒發酵期、治理滯後期與形象反轉期。每一階段均體現出平台流量邏輯、公共服務承載力、公眾認知動態與治理系統回應之間的非線性互動特徵。

1. 熱度啟動期：流量驅動下的關注聚焦

該階段通常由網絡平台推動形成城市關注熱點，具有傳播速度快、參與門檻低和情緒捲入強的特點。城市因某一特定事件（如淄博燒烤）、特色消費（如天水麻辣燙）或景觀文化（如哈爾濱冰雪大世界）獲得短期集中曝光，平台通過演算法推薦將內容多次推送，公眾在短時間內完成興趣聚合。在此過程中，城市被賦予某種集體象徵意義，成為社交互動的話題入口。這一階段的核心機制在於平台演算法與使用者參與共同形成資訊湧現，啟動大量潛在訪客的出行動機，構建短期爆紅的初始條件。

2. 服務錯配期：結構性矛盾的初步顯現

城市突然湧入大量遊客，造成服務體系的資源結構迅速失衡。由於原有接待能力、基礎設施、公共秩序維持機制等多為常態配置，難以滿足急劇上升的需求，導致交通擁堵、食品安全隱患、住宿短缺等問題頻發。在此過程中，遊客體驗感下降，個體不滿情緒逐步積累。這些不滿通過社交媒體快速表達並被擴散，在公共認知中形成落差感和被誤導印象。該階段的關鍵在於流量預期與承載能力之間的反差構成了社會風險的初始積聚點。

3. 情緒發酵期：群體認知與平台機制的共振放大

在本階段中，負面體驗在社交媒體中不斷傳播，逐步聚合為公眾情緒表達的主導方向。在演算法機制推動下，使用者更傾向於轉發、評論或點讚帶有批評、諷刺，甚至攻擊傾向的內容，平台反向放大負面敘事，形成負面內容、平台曝光、使用者互動的迴圈鏈條。與此同時，網絡群體認知開始轉變，原先對城市的好奇與期待被不滿與失望所取代，部分城市甚至出現高開低走的標籤化評價。此階段社會風險由個人情緒轉化為網絡共識，網絡認知環境對現實城市形象構成系統性挑戰。

4. 治理滯後期：制度應對與輿情預期的錯位博弈

面對情緒發酵，地方政府往往嘗試通過回應、整治和宣傳等手段進行危機控制。然而，此階段治理往往面臨慢回應、弱引導、強情緒的壓力困境。一方面，傳統線性治理機制難以適應網絡資訊傳播的非線性交互邏輯，導致響應節奏滯後、資訊覆蓋不足；另一方面，公眾對城市紅利兌現和責任擔當具有更高預期，治理舉措若缺乏情感共鳴與行動協調，極易被視為官僚冷漠或避重就輕。該階段治理系統與網絡認知系統之間的錯位加劇風險升級，甚至引發政府二次失誤的輿情危機。

5. 形象反轉期：公眾敘事重構下的聲譽危機

風險進入最後階段時，公眾情緒趨於集聚化和標籤化，城市整體形象陷入負面敘事主導之中。一些城市從原本的網紅典範迅速被敘述為管理失能的反面教材。該階段不僅影響旅遊熱度與經濟收益，更對地方政府聲譽、社會信任度及未來發展環境構成系統性威脅。此外，網絡記憶的持續性與平台標籤機制可能導致城市形象的負面認知固化，即使實際問題緩解，城市形象恢復週期仍被顯著延長，社會風險實現從現實擾動向長期認知損傷的轉化。

（二）社會風險形成的關鍵影響因素

在“網紅城市”社會風險的動態演化過程中，各類風險要素並非孤立作用，而是以耦合方式介入不同階段，推動風險從個體不滿擴展為群體情緒再演變為城市治理危機。基於路徑分析結果，本文將社會風險的形成機制歸納為四類關鍵影響因素：平台傳播因素、公眾認知因素、城市服務因素與制度回應因素。這些變數在不同階段呈現差異化作用方式，構成了社會風險觸發的結構性基礎。

1. 平台傳播因素：風險資訊的加速器

平台傳播機制是“網紅城市”風險生成過程的起始驅動力。以短視頻平台和社交媒體為主導的資訊環境具有低門檻、高互動和強演算法干預等特徵，使得城市熱點內容在極短時間內完成指數級擴散。在正向傳播中，平台通過推送、榜單以及熱門標籤等技術手段提升城市的可見度與吸引力；而在負向演化階段，同樣的機制則放大了遊客的不滿回饋與負面敘事。特別是帶有情緒色彩的內容更容易被平台識別為高互動素材，從而獲得更大曝光，形成風險表達、平台擴散與公眾再激發的放大循環。

2. 公眾認知因素：風險感知的內生機制

公眾認知在風險形成過程中起到心理放大與情緒共振的核心作用。一方面，遊客在網紅標籤影響下普遍形成理想化期待，對城市服務、接待氛圍、文化認同等方面有較高心理預設；一旦現實體驗與預期發生偏差，即可能產生認知失衡，進而引發主觀負面評價。另一方面，公眾在社交媒體場域中並非孤立表達，而是嵌入到社群互動和情緒共鳴之中，容易在“他人也失望”的暗示中強化自身判斷。認知變數的非線性變化常常加速風險向情緒風險的躍遷，是風險從微觀層面向宏觀社會層面演化的重要媒介。

3. 城市服務因素：風險觸發的現實基礎

城市服務系統的供給能力直接決定了城市能否承載急劇上升的人流與關注度，是風險是否從情緒認知向制度困境轉化的關鍵門檻。服務變數包括但不限於基礎設施、公共秩序、商業資源及資訊供給等。在流量衝擊背景下，原本運行穩定的城市系統被迫面臨非常態壓力測試。一旦在短時間內無法完成資源調度、服務優化或秩序維持，城市形象將受到廣泛質疑，並成為社交平台負面輿情的核心內容。

4. 制度回應因素：風險遏制的關鍵能力維度

制度回應能力體現了地方政府在面對風險挑戰時的資訊感知、回應速度、危機溝通與協同治理能力。多數“網紅城市”的風險演化並非始於治理失敗，而是最終因治理不當而形成擴散態勢。尤其在輿情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政府回應若缺乏情緒敏感度、溝通策略與節奏管理，極易造成回應太遲、回應太虛和回應不被信任等二次傷害效應。此外，制度回應的跨部門協作能力、媒體引導機制和公眾溝通語言系統，也在極大程度上影響風險控制的有效性與公共信任的維護。

四、社會風險觸發路徑的機制整合分析

“網紅城市”社會風險的生成過程，並非由單一事件或孤立因素直接觸發，而是在傳播結構、公眾心理結構與治理回應結構等多個要素交互作用下，沿特定路徑逐步積聚並最終顯性化的複雜過程。為進一步梳理風險由潛伏至爆發的內部運行邏輯，本文在前文觸發路徑劃分與關鍵影響因素提煉的基礎上，嘗試整合分析各變數在不同階段中的介入方式與互動機制，構建路徑與變數聯動關係的解釋框架。通過將五個階段性演化過程與四類結構性變數進行系統嵌套，揭示了風險在平台傳播、公眾認知、服務供給與制度響應之間的動態作用鏈條，為理解社會風險觸發的聯動機制提供機制層次上的補充視角。

（一）路徑機制整合的分析思路

為深化對“網紅城市”社會風險觸發過程的系統理解，本文進一步整合演化路徑與結構性變數兩個維度，分析各類要素在風險發展的不同階段中所扮演的功能角色及其交互關係。該機制整合旨在揭示階段性演化與結構性嵌套之間的邏輯關聯，建構一個包括階段推進、變數主導與回饋強化的動態觸發機制圖景，如圖 2 所示。



圖2 路徑機制整合分析圖

從時間序列來看，社會風險的演化過程可劃分為熱度啟動、服務錯配、情緒發酵、治理滯後和形象受損五個階段，體現出由輿情聚焦向情緒釋放、再至制度壓力遞進的非線性趨勢；從結構要素來看，平台傳播、公眾認知、城市服務與制度回應四類變數在不同階段中以主導性、耦合性或調節性形式介入，推動風險狀態在情緒與治理之間不斷轉換。通過構建階段和變數聯動邏輯，可更為清晰地識別社會風險發生機制中的關鍵節點、演化動力與策略介入空間。

（二）關鍵變數在風險路徑各階段的作用機制

社會風險的演化過程並非由單一變數線性推動，而是在不同階段中，多個結構性要素以不同形式參與、聯動與轉化，形成由驅動、放大、遞進直至固化的風險觸發鏈條。為識別風險路徑推進過程中的變數嵌入方式與主導關係，本文將平台傳播、公眾認知、城市服務與制度回應四類變數映射於五階段路徑結構中，分析其動態嵌套邏輯與功能角色轉換。

在熱度啟動階段，平台傳播變數構成風險外部觸發的技術基礎。社交媒體平台通過演算法推薦、話題

引導和情緒標籤，迅速將城市某一特徵事件推送至全國性關注中心，形成注意力集中與期待預設的初始條件。該階段風險尚未顯性化，但平台機制已塑造出潛在的風險感知環境。

進入服務錯配階段，城市服務變數成為風險顯化的首要誘因。資源配置能力與遊客數量間的落差導致體驗斷層，形成公眾認知上的負面回饋。同時，服務響應的不足亦會刺激公眾在社交平台的表達行為，為後續的情緒放大奠定內容基礎。

情緒發酵階段是風險加速擴散的核心節點。公眾認知變數在此階段迅速上升為主導因素，個體情緒通過社群互動與平台放大機制，實現從個體化體驗向群體性共鳴的躍遷，負面標籤被快速固化並廣泛傳播。

治理滯後階段體現了制度回應變數的關鍵作用。此時地方政府雖已介入，但由於回應節奏、話語方式或處理策略與公眾期待存在偏差，治理行為反而可能被解讀為冷漠、敷衍或應付，引發信任危機，進而激化風險態勢。

最終在形象反轉階段，多個變數共振交匯，城市形象在公眾認知中發生根本性轉化。平台傳播繼續維持標籤擴散，公眾認知趨於穩定化負面評價，治理回應疲態難解，風險實現由情緒危機向長期聲譽損害的轉化。

（三）路徑機制整合的特徵與理論價值

通過對“網紅城市”社會風險觸發路徑及其核心變數之間互動關係的系統整合，可歸納出該類風險形成過程的若干關鍵機制特徵，並據此進一步認識其理論意義與研究價值。

首先，社會風險的觸發機制表現出階段演進與變數主導耦合的結構性特徵。風險演化並非暫態爆發，而是在平台傳播、公眾認知、服務供給與制度響應等因素的交替主導下，沿着一定邏輯路徑逐步累積、遞進與外顯。這一機制整合邏輯揭示了風險生成並非隨機或偶發，而是高度結構化的社會過程，為後續研究提供了清晰的過程建模路徑。

其次，該機制體現出傳播系統與制度系統之間的結構張力。平台機制決定了風險資訊的擴散路徑與節奏，而制度體系的回應機制則受制於治理資源、組織程序與風險認知等要素，兩者之間往往存在非對稱性，進而形成階段性治理滯後。這種張力關係不僅影響風險的外化速度，也影響治理干預的適配性與有效性，是理解當前“網紅城市”治理困境的核心理論視角之一。

最後，社會風險的路徑機制具有從事件性擾動向結構性失衡演化的趨勢。初期的局部衝突或服務問題，若與公眾情緒結構和平台放大機制交織，極易演變為制度信任與城市形象層面的系統性危機。這一現象提示應從結構邏輯而非事件單元出發，重新理解社會風險形成的認知機制與行動回饋鏈條。

五、治理建議與對策啟示

基於平台傳播、公眾認知、城市服務與制度回應四類關鍵影響因素，本文將“網紅城市”社會風險的治理對策與公安機關核心職能相結合，構建從風險識別到風險調控的策略鏈條，提升建議的針對性與可行性。

（一）針對平台傳播因素：構建情緒識別與輿情風控機制

公安機關應強化對短視頻平台、社交媒體熱點話題的情緒結構辨識能力，依託網安、情報等技術力量，構建基於自然語言處理與群體心理預測的預警模型，提升對事件演化中風險敘事與煽動性話語的識別準確率。對於帶有極端情緒傾向的關鍵詞與內容節點，應提前觸發風險預判機制，聯動平台實施內容限流、預警提示與節奏緩釋。此舉可為公安情指部門提供決策前置信息，實現社會風險的線上端口前哨感知。

（二）針對公眾認知因素：建構共情化警務溝通機制

當前公安應對社會風險時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信息充足但情感缺位。面對輿情場域中的不滿與焦慮，應通過本地民警現身說法、警民互動直播與本地化短視頻，強化與民同感的情緒鏈接能力。建立情感導向型話語體系，在資訊發佈中融入人性化敘事，降低政策信息與大眾期待之間的溝通落差。公安政務新

媒體應提前建立熱點應對素材庫與話術範本庫，在事件早期即發出第一波權威聲音，提升公眾信任感與認同度。

（三）針對城市服務因素：構建警務支撐型應急服務聯動體系

公安部門應作為城市服務體系的壓艙石，參與設計公安、市政和文旅部門相協調的應急支援機制。針對突發性人流集聚場景（如網紅景點排隊潮），設立臨時巡邏點與秩序疏導哨位，並配置高靈活度的微型調處組，實現群體感知異常、快速現場響應以及風險釋放的一體化閉環。充分發揮公共安全視頻、GIS系統與智慧巡控平台的整合效能，提升公安部門在突發高密度服務壓力下的調度韌性與應對彈性。

（四）針對制度回應因素：完善警地協同機制與治理節奏管理

公安機關應牽頭構建一套以時效、情感與透明度為核心指標的網絡輿情應對節奏模型，避免政策公佈時間過晚、用詞生硬、缺乏情境化回應等弱點導致治理反噬。定期與地方文旅、交通、商務等部門開展跨平台輿情會商與案例聯合複盤，將輿情風險納入常態化風險評估與預案修訂流程中。建立治理回應時間節點表與多渠道資訊發佈制度，提升整體治理回應的效率與感知效果，實現風險回應從滅火式向節奏型轉變。

總體而言，公安機關在應對“網紅城市”社會風險中應由被動維穩者轉型“風險調節者與治理共創者”，主動介入從線上感知到線下控制、從信息發佈到情緒管理、從單警響應到跨部門聯動的全鏈條治理流程中，構建具有數位識別力、制度協同性與社會共情力的城市風險防控體系。

六、研究結論

本文圍繞兩個核心問題展開研究：一是“網紅城市”社會風險的主要影響因素及其結構性特徵；二是社會風險如何在現實事件與媒介傳播中被激發、積聚並沿特定路徑發生。通過構建階段推進與變數聯動的分析框架，識別典型風險演化路徑，提煉關鍵影響要素，系統回答了上述問題，並形成如下研究結論：

第一，“網紅城市”社會風險呈現出階段性演化的突出特徵，普遍經歷熱度啟動、服務錯配、情緒發酵、治理滯後與形象受損五個遞進階段。風險的發展路徑常由平台輿情驅動起始，經由公眾認知放大與城市服務失衡持續累積，並在制度回應失配的情境中最終爆發。該過程體現了數位媒介環境下城市社會風險生成的非線性鏈條與耦合演進機制。

第二，風險形成過程具有典型的多變數交互結構。平台傳播、公眾認知、城市服務與制度回應等要素在不同階段輪替主導風險推進，並以耦合聯動方式推動風險態勢升級。平台機制承擔資訊聚焦與情緒放大的作用，公眾認知反映集體情緒的聚合路徑，服務系統承載風險顯化的現實基礎，而制度回應則在後期起到風險遏制或再激化的調節功能。

第三，本文通過整合階段路徑與變數機制，提出了一個以階段演進與變數聯動為核心的風險觸發機制分析框架，闡釋了“網紅城市”社會風險在動態傳播系統、認知回饋系統與治理調節系統之間的交互邏輯。該機制框架為理解風險觸發鏈條、識別治理節點與設計干預節奏提供了系統化的分析工具。

第四，結合風險觸發機制的階段性特徵與變數配置邏輯，本文從實務維度提出了以前端感知、過程調控、輿情引導與部門協同為核心的社會風險治理建議。研究強調風險治理應具備前瞻性回應機制、彈性資源調度能力與多平台協同應對能力，為公安機關在“網紅城市”治理實踐中優化資源配置與組織模式提供了分析支撐。